

# “鲁迅饭”，我吃定了

□ 郑心伶

凡熟悉我的朋友，都说我是“吃鲁迅饭”的人。也好，我很乐意接受这个雅号。因为，能“吃定鲁迅饭”，又能为鲁迅工作，无疑是光荣的。

早在读小学五六年级时，语文老师就给我讲鲁迅“踢鬼”的故事，并借《鲁迅作品选集》让我硬啃。因而，我幼小的心灵就慢慢竖起鲁迅的形象，觉得“迅哥儿”真可爱可敬。于是，中小学时代，我读了鲁迅的小说、杂文，并做了许多读书笔记。读大二时，张向天的《鲁迅旧诗笺注》出版，引起海内外一片热议。我感到更大的兴趣，广集有关资料，摘编几大本注释、探索鲁迅诗的各种观点，随时写下自己的见解，并去信向名家请教。没想到，竟收到许广平热情的回信，给我莫大的鼓励。大学毕业前，我终于编写了一本18万字的《鲁迅诗集释》，后来我一边工作一边研究，1982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著的20多万字的《鲁迅诗浅析》。从此开始，我坚持不懈学习、研究鲁迅。至今，我已有许多部鲁研专著问世，如《鲁迅与青年作家》《鲁迅学论稿》《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难雕的塑像》《鲁迅作品赏析与教学》《鲁迅作品人物图典》等，我还连续编辑出版了《广东鲁迅研究》《鲁迅世界》《民族魂》等鲁研杂志。其中《民族魂》是我与友人自掏腰包，送给鲁迅与鲁研的礼物，得到了海内外鲁研界的赏识。

朋友们都说：“没有鲁迅就没有郑心伶的今天。”其实，大凡与鲁迅有不解之缘而又乐于吃“鲁迅饭”者，不知怎的，也都多少沾上一点鲁迅式的“华盖运”。

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在课堂上引用鲁迅的话，说从大石头底下爆出来的芽苗最壮最旺，借以勉励青年学生不要怕困难与重压，经受磨难的人会更坚强。岂料，“文革”一发生，就说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满，“大石头”的比喻是别有用心的。于是，押我戴高帽游街，备受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待到“文革”进入

从1996年发表解读《阿Q正传》的那篇1.6万字的论文习作《文化断带上的游魂》算起，到今年秋天，我涉足鲁迅研究整整17年了。这已接近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白话文学写作生涯的全部时长。但在了解、认识和研究鲁迅方面，过去这17年，对我来说，至多只是经历了登堂入室前后的几步胡乱摸索。

与许多前辈一样，我最初闯进鲁迅研究领域，不仅偶然，而且懵懂，与其说是出于自己的觉悟，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模仿和追随。所模仿和追随者，当然不是那会儿即便在文坛和学界的很多角落，都已经走得很远的鲁迅本人，而是近在身边的鲁迅研究名家：为我们连开几门课的王富仁老师、时时出现在讲座和答辩会上的钱理群老师。今天再看，王老师和钱老师他们，在鲁迅研究史上，其实仍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一代。贯穿在他们的表达和思考中的那种沧桑感、沉重感和宏阔感，在他们那里已经有了最好的形式和效果，用不着也不可能由谁来模仿和追随。

意识到这一层，是在我自己尝试写鲁迅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鲁迅和鲁迅作品本身的困惑所在和兴趣所向，无法叠合进自己想要模仿和追随的几位老师惯用的论述框架内。在那样的论述框架里，鲁迅的伟大和崇高，已毋庸置疑、无需论证，要推究肯定的是，是鲁迅具体在怎样的意义或维度上成就了他的伟大和崇高。而对我辈人来说，鲁迅其人其文的伟大和崇高，还是一个必须靠我们自己并且用我们自己信得过的方法来重做验证的新命题。

1997年，我离开鲁迅生活过14年的北京，来到鲁迅文学生涯最后10年历史现场的所在地上海，攻读博士学位。这

# 鲁迅的至诚之声

□ 沈金耀

在不同的村落，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文化，成为某种文化的人。当地球成为一个大村落，自然会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对话，并进而创造新的文化。而交往对话的前提是各种文化都能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

由此想到鲁迅的“至诚之声”。鲁迅曾慨叹旧中国的无声，希望中国有人能像摩罗诗人那样“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摩罗诗力说》）。鲁迅希望别人做的事情自己首先努力去做，于是以数百万字的著作发出“至诚之声”。近百年来，这至诚之声时时回荡在我们耳边。

鲁迅的声音，最强烈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贫穷落后之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旨在唤醒民众，奋起自立。在多元文化频繁交往、相互对话的当代，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却突显了另一个重要的意义，鲁迅的至诚之声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创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基础。因为只有至诚之声，才能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真正对话。如鲁迅所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中国文明是伟大的文明，先贤们创立的各种文化理想是美好的，但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尽善尽美地实现先贤的文化理想，在文明的进程中也难免发生各种病变。当中国文化隐疾发作时，中国陷入了贫困落后。要克服文化自身的缺陷，必须身处文化之中的人能发出“至诚之声”，医治自身文化的病。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揭开了传统文化黑暗的一

面，开启了真诚对待自己的文化态度，也确立了真正与其他文化对话的立场。作为当今世界上的大国，在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同时，也应有足够的自信反思自己文化中的不足之处。敢于面对自己文化的丑陋之处，才是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真诚相对的姿态，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的眼里中国曾经被描述为丑陋的他者，于是，我们许多有识之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以纠正西方人的偏见。但往往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刻意美化或迎合西方兴趣的叙述并不能呈现真实的中国文化，也无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真正交往，不利于人类新文化的形成。不同文化之间只有真诚、全面地呈现自己才可能促进相互了解、共创新文化。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作至诚之声，是为了更新传统，以立善美刚健之人。鲁迅为人，极为真诚。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其非黑白大多心知肚明，但更多的人是因为名誉、地位、安全而缄默不语，但鲁迅真诚地说出来了，发出“至诚之声”，呈现至诚的人格气象。

鲁迅的“至诚之声”，深深感动了我，我在鲁迅杂文的解读中聆听鲁迅的至诚之声，感受鲁迅的人格气象。在挫折中让我奋起，在喧嚣中让我清醒。我想，我们应响应鲁迅的至诚之声。

敢于发出至诚之声，是大国风范，我们得以真诚地立足于世界。追求至诚的境界，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正当方向。

（作者为闽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诗学研究所副所长）



量、一个目标，“真”与“爱”永远铭刻在我们的生命版本上，以续不老的鲁迅情缘。

“吃鲁迅饭”有啥不好？我是吃定了。但愿此碗“鲁迅饭”吃得更香更饱，让鲁迅之“魂”，真正附体、入心、开窍。也希望更多的同道者，携起手来，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并肩前进。管它风云如何变幻莫测，“民族魂”鲁迅及其文化地位，在全世界是不会褪色、退席的。

（作者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鲁迅研究会会长、《民族魂》主编）

文学的多重困扰和多重追求，及其思想、情感和文体上发生的一连串复杂变化的重要印记。

为把这些心得充实、完善成可供学界同好共同切磋的严整形式，我费了好几年工夫，陆续整理发表了约10万字的系列论文，但总还是觉得言不尽意、力有未及。此后我读写思考的重心，落在了之前研究的遗留问题和相关知识空白上，比如鲁迅校古籍、鲁迅留日期间的文言译作、鲁迅书信、鲁迅译文序跋、鲁迅著作和译述中的域外因素。这都是我以往不很熟悉的领域。所幸的是，张梦阳、赵京华、李冬木、张利华等老师的一系列著作和不经意中的指点，给了我雪中送炭似的帮助。近来我写的几篇有关《彷徨》《朝花夕拾》以及鲁迅后期杂文与鲁迅和尼采的论文，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一些初步收获。

就在这效率低得仿佛磨洋工的劳作中，跨过“四十而不惑”之年的我，却常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的鲁迅研究是否已在不一不留神之际走了没出息的“老路”或者剑走偏锋的“邪路”。可有时转念想想，我这自我怀疑八成也是多余。在当今这个所有的鲁迅同时代人都已凋零殆尽的、真正的后鲁迅时代，和鲁迅对话、拿着鲁迅说事，不早已成了一种公共的话语权利了么？在这样的年代，对我们这些读熟了《鲁迅全集》和鲁迅史料的人来说，坚守住自己实事求是的学术品质底线，不跟风，不起哄，不为形形色色的消费鲁迅的八卦和花边姑脚助威，更不从中捞油水，只为自己认得准、信得过、靠得住的鲁迅说话，兴许这就是一条对得起鲁迅、也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读者的堂堂正正之道。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

从文化传播或我的感受角度可以说：我与鲁迅有“三缘”。

首先是有“人生之缘”。因为人生体验的相近可以拉近心灵的距离。尽管有时代的变迁甚至是改朝换代的巨大变故，但苦难人生的体验大抵仍然是相通的，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家道中衰”，令我对鲁迅有颇为深切的认同，那看透世态炎凉、世人面目心境也似乎萦绕于心而难以摆脱。清末发生于周家台门的“家道中衰”，和“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家道中衰”固然有明显区别，比如鲁迅祖父的科场案和我父亲的“走资派”各有其“时代特色”，但引发家境大变而从小康之家堕入穷困则庶几相近。鲁迅故事具有很浓的励志意味，即使在非常强调政治或革命的时代，接触鲁迅生平的有心人仍能在感叹人生维艰的同时，意识到人生与磨难的关联及其锻炼意志的意义，意识到苦难人生恰恰能增强人生历练和适者生存的能力，从而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和智者。我与鲁迅的结缘，还曾使我长期节衣缩食省出钱来购买与鲁迅相关的书籍，并且喜欢购买“金不换”毛笔和模仿鲁迅式的书写“行为”，从中似乎也能体会到与鲁迅精神气息的相通相连。近年来，我还乐于效法鲁迅用书法馈赠师友，特别是爱书写鲁迅的诗文以赠友人。窃以为这也是传播鲁迅人生经验及“鲁迅文化”的一种方式。

其次是有“学研之缘”。生存有赖学习，特别是“异地求学”，令人逐渐将人生的蓝图展开，习得文化话语和生存本领，其意义至关重要，虽圣贤和草民皆莫能外也！我从小学起就接触了鲁迅，“文革”中即使在“戴帽中学”就读，也能接触鲁迅，尽管那时被阉割的鲁迅多被曲解和利用，但诚实的人依然能从鲁迅的诸多言语中体会到人生的启迪和批判的犀利。待恢复高

考进入大学，我在本科学习阶段便自觉地多接触鲁迅，并得到过著名学者吴奔星、陈金淦等老师的教育和点拨。特别是在吴奔星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使我写成了题为《试论鲁迅〈野草〉国民性思想和“化丑为美”艺术特色》的毕业论文，并在毕业后有机会借重此文参加了江苏鲁迅研究会及该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即下定决心要考研究生了。于是报考了西安一所高校，并由此从苏北到西北开始了数十年“走西口”的人生历程。硕士阶段，我读了很多关于鲁迅的书籍，其中有我导师黎风的老师李何林先生关于鲁迅的书，也有很多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和后来者的研究著作。我在读研期间写过不少习作，其中发表的就有8篇，半数皆与鲁迅有关。为了熟悉鲁迅研究并撰写硕土学位论文《鲁迅与茅盾农村题材创作比较观》，我曾转益多师，向林非、单演义、张梦阳、张华、王世家等先生当面请教，受益良多。特别是我第一次踏进中国社科院大门见到了张梦阳先生，听讲之余还看到他在研究室屋中放着小床，得知他经常不下班就在这里从事研究和休息，我才知道搞研究可以如此专注和拼搏，这对我确实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毕业后，我仍然坚持从事鲁迅研究，曾和师弟阎晶明合作论文《建构“立人”的系统机制——鲁迅论中国人》，此文发表后即为人大报刊资料复印。后来，为了进修，我进了北师大王富仁先生的门，为了攻读博士学位我又进了武汉大学易竹贤先生的门，都多有增益。多所承教、多有启迪，也多有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我与内地的东南西北中不同地域的老师们都多少结下了学研之缘。我曾在关于鲁迅的两本著作《民族魂与中国人》《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有内地和台湾两个版本）的后记中，对相关情况都有所介绍，这里且从略。但不能从略的是我对许多学术先辈、老师及编辑先生们的感激之情！

再次，我与鲁迅有“教研之缘”。如果说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中学语文教师时，还只能“传授”鲁迅作品，那么当我于1986年成为高校教师后，则一直注意将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从教过程中，讲授鲁迅与鲁迅研究成为我最喜欢的课程，与研究生们讨论鲁迅，也成了教学相长的有益之事。我曾多年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鲁迅选修课，讲授鲁迅时经常脱稿发挥，且能理论联系实际，讲述鲁迅与人生、与文学、与社会、与世界以及与时政的种种关联，显示着“学为世用”的学术取向。比如，我曾有意识地引导我的博士生周惠研究鲁迅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且很快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论文，其后续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也包含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我常常引导学生进入鲁迅研究的“实验场域”，强调实验性研究与鲁迅研究的关联，认为在此基础上的学术进取具有实验性和挑战性，在鲁迅研究中进行学术操练，可以获得学术经验和学术信心等等，对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奠基性的意义。近年来，我仍然衷于从事鲁迅研究方面的活动，兼任着中国鲁迅学会副会长、《国际鲁迅研究》集刊编委等职，不仅积极组织过全国性的鲁迅研究会议，主编了《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还特别能够坚持引导研究生关注鲁迅研究，近期就与我的多位博士生研究了有关鲁迅的多个论题，且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当我在出国旅途中撰写这篇小文时，我觉得鲁迅及鲁迅文化滋养了我和我的学生，进而也与这个生生不息、春秋代序的世界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关联。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我与鲁迅有“三缘”

□ 李继凯

动初期，鲁迅与胡适都是积极“打鬼”的批判派，只是后期做了大使和中研院长的胡适进入体制，批判的精神有所减弱，而鲁迅本人则毕生都在致力于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这种社会文明批判秉持着的是民众的立场、人本的理念，体现出的是积极介入现实的公共情怀、独立思考的精神原则、以及不惮于做少数派的英雄气度，当然也包括鲁迅在个人信仰上的纯粹性。这种批判精神，可以说上承马克思、尼采，下接萨特、法兰克福学派、德里达，是20世纪中国精神与世界精神主潮的一次成功对接的范例。当前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如何，很难一概而论，但我们的民族文化建设，积弊重重，痼疾甚多，仍然需要鲁迅这样的具有纯粹信仰的批判型文化战士来承担社会文化批判的任务，来体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中坚作用，使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建设始终保持一种人文的取向、清醒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才能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社会改革的窗口，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文化精神资源。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